

## 教育與貧富懸殊的研究

1月31日，筆者發表一項關於貧窮家庭子弟入讀大學的研究，受到傳媒廣泛報道，自己也有些驚訝；之後應邀接受電視、電台和報章訪問，反映社會大眾非常關心下一代。

筆者過去主要的政策研究課題多是退休保障和新移民的問題，最近才開始研究有關貧窮的問題。為什麼會研究這個問題？其實源起於前任特首曾蔭權對貧富懸殊的一番話，他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說：「在一個成熟、自由、開放、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貧富差距難以徹底消除，長遠而言是要靠投資教育、提高社會流動性，以減少跨代貧窮」。因此一直以來，政府相信只要增加大學學位的數目，便可以讓更多貧窮家庭的第二代能夠接受高等教育，以致於他們能夠成為專業人士，並晉身中產，成功脫貧。

### 富有學生增幅最大

的而且確，政府在過去二十年大大增加大學學位的數量，以致現在有 18% 適齡青年能夠升讀大學。我們研究的結果也都反映了這一點。

筆者的研究是分析 1991 年和 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首先，從樣本中選出年齡由 19 至 20 歲的青年，結果顯示當中正入讀大學的百分比已經由 1991 年的 5.6%，上升至 2011 年的 19.3%；然後再根據他們住戶收入選出兩組：貧窮線（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分界）和最富有的 10%。

最令人震驚的結果是，當比較這兩個組別在入讀大學的百分比在過去二十年的變化。生活於貧窮家庭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由 1991 年的 8.0%，上升至 2011 年的 13.0%，上升近 62.5%。不過，相比起生活於全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他們的升幅便顯得很少了，因為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的比例，由 1991 年的 9.3%，上升至 2011 年的 48.2%，升幅逾五倍。

亦即是說，1991 年時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機會，只比貧窮家庭青年多 20%（ $9.3\% \div 8.0\% \times 100\%$ ），到 2011 年時，這個比例已升近至三倍（ $48.2\% \div 13.0\% \times 100\%$ ）。當中在海外大學升學的都已計算在內。如果扣除海外升學的青年，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升讀本地大學的比例，仍是貧窮家庭青年的兩倍（即高出一倍）。

### 研究結果帶出啟示

筆者認為，研究結果對於政策有幾個啟示：

一、過去政府的政策的確增加基層向上流的機會，但是對於收窄大學不平等（educational inequality）現象不但沒有幫助，而且這個問題在過去二十年亦變得愈來愈嚴重。由此看來，增加大學學位並不能解決大學教育不平等的問題。筆者估計，隨□中小學入學制度的改變，這不平等的情況只會在未來十年惡化得更利害。政府確實有需要落實對基層兒童傾斜的政策，避免這個問題進一步惡化。

筆者希望關心貧窮兒童問題的社會人士明白，教育的不平等性是評估貧窮兒童問題的嚴重程度和扶貧措施對它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

另一方面，一些讀者對這個研究有其意見或批評，筆者希望在這裏可以解說一下。有人認為大學收生大多以公開試成績作為取錄與否的標準，而且政府亦設有助學金，所以基層青年不會因經濟問題而不能入大學。

雖然筆者的研究□眼於青年現在的家庭收入和他們就讀大學的關係，但筆者其實想說明的是，在貧窮環境長大的年輕人在起跑線上，其實已經輸給富裕家庭長大的同輩。這個亦是這次研究的一個弱點。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青年現在的家庭環境是否和他們在孩童時一樣或相似。所以最理想的研究是，知道年輕人在他們孩童時的住戶收入，但是這個是較難做到的。一般來說，我們須要進行追蹤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或依賴青年父母的記憶。

二、有讀者指出，相比起 1991 年，2011 年時香港已發展一些自資大學的學位課程，所以有錢而成績較差的學生大可報讀這些課程，所以富有家庭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才這□高。筆者並不太同意這個解釋，原因有兩個。一、自資大學學位的數量比起政府資助的仍佔少數；二、研究發現生活於貧窮家庭的青年入讀如副學士等專上教育課程的比率，竟然高於最富有一成家庭的青年，這點是筆者的研究中另一個較少傳媒報道的結果。結果顯示，貧窮家庭的青年並非不想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因為成績問題退而求其次而入讀這些課程。

三、有評論認為造成高等教育貧富懸殊的原因，未必是筆者所稱的名校轉直資，反而是教育界所鼓吹的多元學習模式，以致課外活動及遊學活動費用大增，令基層兒童輸在這另類起跑線上。

其實，這些可能都是高等教育貧富懸殊的部分原因。外國研究發現，基層兒童輸在起跑線上主要有兩個原因：基層兒童家長在管教子女方法上較差；他們投放在子女上的資源（時間和金錢）都比較少。

筆者的研究充其量只能道出這問題的嚴重程度，實在有賴其他研究人員探究其成因，讓

我們可以對症下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曾國平博士亦在《信報》撰文，指出研究只能顯示住戶收入和就讀大學的相關性（**correlation**），而不能顯示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點筆者是同意的，所以筆者如前所述，兩者的因果關係需要一些追蹤研究的數據加以肯定。

引起社會關注貧窮兒童

曾博士亦提出，因為近二十年大學學位大幅增加，現在大學學位的質素已經大不如前。所以筆者比較 1991 年和 2011 年的大學入學率無疑是蘋果和橙的比較。所以曾博士提議選擇幾個熱門課程（如醫科或法律課程），看看學生的家庭背景是否大多來自富裕家庭。不過，人口普查根本沒有這些資料，所以筆者的研究並不能對此分析有關數據，但絕對同意這是未來研究的方向。

除了學科的性質外，大學本身的排名或知名度亦是相當重要的。

曾博士提議筆者運用「複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了解每個因素（如父母學歷、家庭結構等）對入讀大學的影響。筆者以往的研究都有運用這些較複雜的統計學方法分析數據，但這個是新聞發布會，筆者想以較簡單的方法令社會人士關心這問題，我想大部分學者都會認同這個做法，畢竟曲高和寡是於事無補的。而且這種複雜的分析方法不是每次都是可行的，例如可能根本就沒有最富裕 10%的家庭是單親的。

最後，曾博士提出除了教育之外，貧富懸殊的原因亦可以是智商或性格的遺傳。

筆者對這些看法沒有多大異議，但是這些原因對於公共政策的制訂又有什麼裨益？

篇幅所限，筆者並未能對所有批評和指正作出回應，筆者其實只是用這些順手牽來的數據作一些簡單的分析，以引起社會對貧富懸殊和貧窮兒童的關注而已。

每位學者都知道，每個研究都有它的缺點，我們需要的正是更多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討論。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教授

周基利